

圣址平叛与圣地驻军： 伊斯兰激进主义的转向*

• 钮 松

[内容提要] 脱胎于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暴力恐怖主义已在全球泛滥，“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先后成为具有全球代表性的恐怖组织。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兴起与西方有着莫大关联，这涉及1492年伊斯兰世界较欧洲而言开始的整体衰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出于反对协约国而采取的有意培植，以及冷战期间西方凸显反对无神论而进行的拉拢，尤其是后两者不断促进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化。1979年的诸多事件标志着宗教在现代国际关系开始真正“登堂入室”，其中就包括麦加大清真寺劫持事件；1991年圣诞节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在欧洲的结束，而年初的海湾

*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16ZDA09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现代国际关系视角中的伊斯兰朝觐研究”（13CZJ017）、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16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现代国际关系视角下的伊斯兰朝觐政治研究”（161086）和教育部国际司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的资助。

战争在其中发挥了“临门一脚”的作用。在这两个标志性时间节点上发生的两大事件都与伊斯兰圣地有着密切关联，即法国国家宪兵特勤队（GIGN）在朝觐期间的禁寺圣址平叛和美军大规模进驻沙特并辐射麦加。由于宗教圣地（圣城、圣址、圣物等）具有特殊而显要的宗教意味，异教徒尤其是异教武装分子对其的介入，在伊斯兰激进主义看来都是异教徒对圣地的亵渎，保卫圣地成为其无法撼动的底线。1991年美苏争霸基本结束的大背景下，美军圣地驻军成为了促成“基地”等伊斯兰激进组织最终完成其恐怖转向的“最后一根稻草”，而法国因圣址平叛成为了新历史时期的矛头所指。经过10年酝酿，美国在阿富汗豢养的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在2001年发动了针对美国的“9·11”恐袭，而“法国版9·11”恐袭最终由被“基地”组织除名的原伊拉克分支“伊斯兰国”在2015年上演。

【关键词】伊斯兰圣地 朝觐 沙特 伊斯兰激进主义 恐怖主义

冷战结束后，尤其是“9·11”事件以来，打着伊斯兰旗号的恐怖势力展开的全球恐袭活动层出不穷，以本·拉登为首的“基地”组织便长期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标杆”。2001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推翻塔利班政权，“基地”组织失去了大本营而向外转战。2003年3月，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支离破碎的伊拉克成为诸多激进势力和恐怖势力的汇聚之地，其中便包括“基地”组织的伊拉克分支，该组织便是从阿富汗迁徙而来。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国际恐怖主义态势发生了变化，2011年便是一个分水岭：一方面，2011年3

月，叙利亚内战爆发，使得“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除了在伊拉克形成割据以外，还将势力拓展至叙利亚境内，逐步形成了叙伊边境地区的恐怖存在，并在此基础上以国家政权的形式展开统治，2014年更名为“伊拉克与沙姆地区伊斯兰国”。另一方面，2011年5月，本·拉登被美军击毙，“基地”组织仍肆无忌惮地展开恐怖袭击活动，但随后几年“基地”组织势头明显被其伊拉克分支盖过。随着伊拉克分支的更名和“建国”之举与“基地”组织理念产生分歧，“基地”组织随即将其除名，双方之间自此在实施恐怖主义方面展开竞争，“伊斯兰国”成为新的国际恐怖主义“领军者”。随着美俄协同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武装的深入，“伊斯兰国”在伊叙的有形存在自2017年下半年开始已呈“日薄西山”之势。“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之间的实力此消彼长，但“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外流和回流对国际社会造成了新的恐怖威胁。尽管两者之间存在竞争与诸多不合，但其矛头主要指向美国和欧洲，这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其内在的逻辑所致。这与欧美，尤其是法国和美国在关键历史节点在伊斯兰最为神圣的圣址——麦加大清真寺，以及坐拥并守卫伊斯兰两大圣城的圣地沙特的所作所为有着紧密关联。

1979年是宗教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真正“登堂入室”之年^①，当年年初的伊朗伊斯兰革命、11月20日（伊斯兰历15世纪的首日）麦加大清真寺事件及平安夜苏军入侵阿富汗三大事件，标志着伊斯兰教强势介入现代国际关系，直接结果是催生了“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出现。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法国

^① 参见徐以骅：“宗教在1979年”，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十三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16年版；Christian Caryl, *Strange Rebels: 1979 and the Birth of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3)。

国家宪兵特勤队（GIGN）参与了沙特政府的麦加大清真寺平叛活动，特别是法国宪兵队主导了平叛方案并提供了大量化学武器和先进军事装备，法国自此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敌人，“由西方人来夺回禁寺，导致法国人成了穆斯林最憎恨的人”。^① 1990年伊拉克入侵和吞并科威特遭致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联合国授权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于1991年初发动海湾战争，解放了科威特并对伊拉克造成巨大打击。“海湾战争不仅对中东地区的政治生态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于冷战在欧洲的结束起到了关键性的‘临门一脚’的推进作用”，“美国取得了美苏争霸的胜利，但其利用海湾战争驻军圣地的行为又开启了其与伊斯兰极端势力之间的冲突，对美国而言，‘绿色威胁’开始取代‘红色威胁’构成对西方的最大挑战”。^② 法国秘密参与麦加大清真寺武力平叛的1979年和美军扩大驻军沙特的1991年，分别是宗教切实影响现代国际关系的肇始之年和以苏联解体为标志的冷战在欧洲的结束之年，而“恐怖大亨”本·拉登则与这两大事件如影随形。本·拉登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就1979年的圣址平叛事件，向其助手私下表达了对那些劫持数千名无辜朝觐者的恐怖分子的同情，他认为“夺取麦加的那些人是真正的穆斯林……他们没有犯任何罪，并且……他们被无情地杀害了”。^③ 本·拉登对美军海湾战争后大规模进驻沙特充满愤怒，“本·拉登及其辩护者因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穆斯林的遭遇谴责了美国，并将其打上了伊斯兰的侵略者和玷污

① [法] 阿兰·鲍尔、[法] 扎格维埃·罗费尔著，蒋海然、任轶译：“宗教狂热与恐怖主义”，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十五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17年版，第123页。

② 钮松：“海湾战争与欧洲冷战的结束”，载《军事历史》，2017年第6期，第11页。

③ Yaroslav Trofimov, *The Siege of Mecca: The Forgotten Uprising in Islam's Holiest Shrin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7), p. 247.

者的标签，因为它在沙特阿拉伯部署军队”。^① 本·拉登在麦加大清真寺事件中对朱海曼为首的暴恐分子的同情是其宗教激进主义思想的发端期，参加抗击苏军入侵阿富汗的十年“圣战”是其思想与组织的成型期，在美军利用海湾战争大规模进驻沙特后对美决裂并对其驻中东军事目标展开袭击是其从宗教激进主义迈向恐怖主义的转型期，而策划并实施“9·11”事件则是其恐怖主义国际化与常态化的成熟期。在圣址平叛到圣地驻军两大涉教事件及其所标志历史转折时刻的共同作用下，伊斯兰激进主义逐步完成了恐怖转向，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的历史就是一个经典案例。

一、圣址平叛：法国国家宪兵骑勤队 与麦加大清真寺事件的平息

宗教圣地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扮演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包括圣城、圣址（敬拜场所）和圣物等具体领域。1979年麦加大清真寺事件涵盖了以上全部领域，即事件涉及伊斯兰第一圣城（麦加）、伊斯兰第一圣寺（麦加大清真寺）和伊斯兰最为神圣的圣物（天房及镶嵌其中的黑石），正因如此，当朱海曼为首的反叛分子在麦加大清真寺劫持数千名不同国籍的朝觐者并号召推翻沙特王室后，该事件的影响力便很快突破沙特国内，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和派出朝觐者的非伊斯兰国家引发了空前轰动。

沙特王国建立在沙特王室与瓦哈比派谢赫家族的联盟与联

^① Barry Rubin, *The Tragedy of the Middle Ea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33.

姻的基础之上，以朱海曼为首的逊尼派反叛者推出带有强烈的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意味的“马赫迪”，并号召推翻沙特王室，这对于沙特立国的根基——王权和教权合法性都构成了剧烈冲击。麦加大清真寺事件时值朝觐时节，即“禁月”，麦加是“禁地”，麦加大清真寺是“禁寺”，如何在“禁月”“禁地”和“禁寺”使用武力平叛确实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古兰经》规定：“禁月内作战是大罪；妨碍主道，不信真主，妨碍〔朝觐〕禁寺，驱逐禁寺区内的居民出境，这些行为，在真主看来，其罪更大。”（黄牛章：217）不仅如此，“禁地”内即便是对动物的杀戮也是大罪：“你们在受戒期间，或在禁地境内，不要宰杀所获的飞禽走兽。”（筵席章：95—96）“真主以克尔白——禁寺——为众人的纲维，又以禁月、供物、项圈，为众人的纲维，这是因为要使你们知道真主全知天上的一切和地上的一切。”（筵席章：97）基于反叛者推翻王室的基本诉求，沙特王室无法妥协，只能寻求武力平叛，一方面寻求瓦哈比派发布“法特瓦”以获得在“三禁”背景下动武的宗教合法性；另一方面则准备着随时采取武力行动。尽管1979年11月22日哈立德国王就下令国民卫队收复大清真寺，但随后一周的战斗却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虽然最为了解大清真寺详细构造与布局且与王室关系亲密的本·拉登建筑公司和朝觐研究中心为战斗提供了详细材料，但效果仍然有限：首先，政府方面害怕对大清真寺造成损坏，反叛者占据了全寺9座尖塔，“军队射手瞄准了尖塔中的狙击手，但是对毁坏圣寺的忧虑限制了反突击行动”；其次，警察、国民卫队和军队等平叛武装之间缺乏协调，“这三大安全力量拥有不同的指挥官，彼此之间互不信任，并因他们使

用不同的电台而无法彼此联络”。^① 尽管在此过程中，自封为“马赫迪”的卡赫塔尼被击毙，但整个局势没有得到扭转，反而大批军警倒在血泊之中。在此危急情况下，沙特不得不考虑寻求外援。

由于年初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和霍梅尼对沙特王室的指责，沙特起初尽量回避与西方合作。约旦最初表示了极大的兴趣，约旦军队号称是英国训练出来的一流军队，曾在与阿拉法特游击队的血战中将“巴解”组织驱逐出约旦，具有实战经验。约旦指挥官与沙特国民卫队一起受美国军事训练团的支持，约旦的精英突击队在安曼附近的马尔卡机场待命。尽管约旦国王侯赛因访问沙特，并先后与法赫德王储、国防大臣苏尔坦王子和哈利德国王见面，但沙特王室因历史原因并不愿意邀请约旦出兵，因为沙特曾“击败哈希姆王室夺回伊斯兰最神圣的圣地”，沙特人怀疑“哈希姆人从未真正接受他们对麦加的失去，并仍在培育一个复仇之梦”。侯赛因国王认为，希贾兹人“被统治当局视为二等公民”，而沙特方面则认为约旦介入此事会被视为大清真寺解放者，这会诱发希贾兹分离主义，正如一位沙特军官所言：“所忧虑的是：假如约旦人前往麦加，他们将不会离开！”^② 可见，约旦虽然是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且拥有英国训练出的具有实战经验的特种部队，但沙特对其完全不信任，这关涉沙特王室对麦加的统治，以及王室起源的纳季德与麦加所在的希贾兹之间的关系问题。沙特还是将目光转向 20 世纪 30 年代便建立起盟友关系的美国。

此时的美国处于卡特政府时期，卡特政府的中情局（CIA）

^① Ziauddin Sardar, *Mecca: The Sacred City* (London: Bloomsbury, 2014), pp. 329–330.

^② Yaroslav Trofimov, *The Siege of Mecca: The Forgotten Uprising in Islam's Holiest Shrine*, pp. 170–172.

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Stansfield Turner）是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局长，他得到卡特总统 1978 年行政命令的授权，管理美国大部分间谍机构的预算，他发现了中情局对美国公民的监视等事件，在听证会上承诺“严格依照法律和美国价值观”来进行情报搜集，并坚持秘密行动“必须谨慎开展”，因为“人民的生命危在旦夕”。^① 1977 年 10 月 31 日，特纳宣布中情局缩减 820 个秘密行动人员的职位，其中 649 个岗位被砍掉、154 人非自愿退休、17 人被解雇，这引起了中情局内部的诸多不满，但得到了卡特总统的支持，卡特在 1997 年公开承认，“我们注意到，一些被他解雇的不合格与不称职人员非常不满”，“但我完全赞成”。^② 到 1979 年，卡特政府中情局的行动能力被大大削弱，甚至中情局沙特站站长乔治·凯夫（George Cave）被执掌沙特情报部门的图尔基亲王驱逐出境。尽管沙特情报部门对中情局充满异议，但沙特国防部还是要求美国政府提供强力的催泪瓦斯和烟雾设备，美国政府最终将沙特国防部的要求转给中情局沙特站，该站在塔伊夫储存有这些装备。^③ 中情局满足了沙特国防部的要求，并通过使相关人员皈依伊斯兰教的方式进入麦加进行实地考察，以规避宗教上的禁忌，但其角色仅限于联络与建议而非直接的战斗。处于地下室的反叛者通过床垫、纸版和布来堵塞烟雾，并通过用水浸湿的头巾来帮助呼吸。由于

① Scott Neuman, "Stansfield Turner, Who Headed CIA under Carter, Dies at 94," in *National Public Radio*, January 19, 2018, <https://www.npr.org/sections/thetwo-way/2018/01/19/579062737/stansfield-turner-who-headed-cia-under-carter-dies-at-94>（登录时间：2018 年 11 月 4 日）。

② T. Rees Shapiro, "Adm. Stansfield Turner, Who Led Major CIA Overhaul as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Dies at 94," in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8, 2018.

③ Yaroslav Trofimov, *The Siege of Mecca: The Forgotten Uprising in Islam's Holiest Shrine*, p. 172.

烟雾不断上升并飘至禁寺庭院和周边地区，因为“自然法则也在朱海曼一边，行动的策划者没有预见到美国提供的瓦斯具有上升的自然趋势”，再加上多数沙特军队不会使用防毒面具，这些美国化学武器反而给沙特军民造成巨大危害，沙特夺回禁寺的行动惨败。^①

对于约旦的戒备和对美国的失望，沙特在危急关头最终选择向法国寻求帮助，这有其必然性与偶然性。必然性上，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频频在非洲展开成功的军事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这与卡特政府在伊朗问题上的妥协形成鲜明对比，特别是法国宪兵特勤队（GIGN）在诸多反恐和人质解救行动上的成功案例有目共睹。偶然性上，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法国在中非帝国的军事行动由法国情报部门“对外情报和反间谍局”（SDECE）领导人亚历山大·德·马朗什（Alexandre de Marenches）组织，而马朗什长期关注沙特并与费萨尔国王及其继承者建立了友谊。图尔基亲王首次与马朗什相见是在1974年，马朗什拜访其父费萨尔国王的时候。1977年，图尔基亲王成为沙特情报部门负责人，开始与马朗什领导的SDECE合作打造秘密联盟“萨法里俱乐部”（Safari Club），以填补卡特政府上台后中情局在该地区留下的真空，这个联盟还包括支持西方的埃及、摩洛哥和巴列维的伊朗。因此，图尔基亲王在危机中亲自给马朗什打电话寻求建议。马朗什清楚大清真寺巨大的宗教影响力，并向图尔基亲王建议道，只有伊斯兰的军队才能介入天房这样神圣的地方。摩洛哥方面也在此时提出派遣由法国训练的皇家宪兵队突击队员前往麦加，但沙特方面不能再经受失败，认为只有法国才能完成使命。经过法国总统德斯坦与沙特国王哈立德的

^① Yaroslav Trofimov, *The Siege of Mecca: The Forgotten Uprising in Islam's Holiest Shrine*, p. 173.

沟通，法沙高官绕过外交渠道展开了直接对话，由法国在利雅得的军事合作代表团的埃尔维·纳夫罗（Hervé Navereau）将军负责。^① 法国方面认识到沙特的行动失败给国民卫队带来了心理重创，“法国是仅存的唯一希望”，“解救一个保障自由世界石油供应的君主政权，已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责任”，任何的行动泄密“会使这个王国的处境更加危险”。因此，法国决定将这个任务交给 GIGN 而非法军，该组织在 1972 年慕尼黑奥运会惨案后成立，当时被认为是欧洲最强的特种部队。这与沙特的想法不谋而合。

其次，沙特内务大臣纳伊夫王子于 1979 年春便在法国小镇萨托里（Satory）亲自观摩过 GIGN 的军事演习，而负责此次演习的就是 33 岁的 GIGN 副指挥官保罗·巴赫尔（Paul Barril）中尉。^② 纳伊夫王子在看完演习后询问巴赫尔能否帮助训练沙特突击队，虽遭拒绝，却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纳伊夫也坦言：“他们是贝都因人，他们甚至不知道怎么游泳。”法国总统德斯坦命令 GIGN 的指挥官克里斯蒂安·普鲁托（Christian Prouteau）上尉“做出最大的可能”，普鲁托确定由其副手巴赫尔中尉领导此次麦加行动。巴赫尔曾在西柏林服役，指挥过 20 世纪 70 年代大量出口到沙特的 AMX-13 战斗坦克，曾穿越柏林墙从事过间谍工作，并帮助 SDECE 搜集整理试图逃亡西柏林法占区的东德叛逃者信息。加入 GIGN 以后，巴赫尔试验过最新的武器和谍报技术，特别是当时异乎寻常的发明——凯夫拉防弹衣。另外两名即将跟随巴赫尔被派往沙特的是 39 岁的宪兵伊格内斯·沃德茨基（Ignace Wodecki）准尉和 32 岁的爆破专家、GIGN 老兵克

^① Yaroslav Trofimov, *The Siege of Mecca: The Forgotten Uprising in Islam's Holiest Shrine*, pp. 177-178.

^② Ibid., p. 188.

里斯蒂安·兰伯特 (Christian Lambert)。^①

法国方面的主要设想是 GIGN 秘密潜入沙特，通过训练沙特武装人员并配备先进武器的方式增强其战斗力。1979 年 11 月 29 日，GIGN 巴赫尔、沃德茨基和兰伯特等三人飞赴利雅得，并换上便装转机后抵达塔伊夫军事机场。GIGN 成员培训沙特有关人员使用及测试防弹衣，以 Tactics101 为基础进行声东击西战术的指导。作为经常去教堂做礼拜的乡村天主教徒，尽管巴赫尔对伊斯兰教了解不多，但他仍关注到此次行动背后的宗教禁忌问题，正如一位沙特军官告诉他，“你知道，假如你想前往麦加，你就得皈依伊斯兰”，他的回应是，如果有助于工作的完成，他会做好皈依的准备。巴赫尔给在法国的上司普鲁托列出了所需的清单：更多的防弹衣、手榴弹、狙击步枪、战地电台、夜视镜、防毒面罩，以及一吨的 CB^②。不仅如此，巴赫尔还打电话给他在西柏林时期的军方友人、此时是总统卫队的负责人，通过他让德斯坦总统了解麦加局势的严重性。^③ 12 月 2 日，一架戴高乐总统曾使用过的法国卡拉维尔喷气机降落在沙特，带来了行动所需要的 300 千克 CB（全部可用的库存）、防毒面具、手榴弹、加气机和 150 件防弹衣。法国方面不希望三位 GIGN 队员进入麦加，普鲁托叮嘱沃德茨基和兰伯特盯紧巴赫尔，如果巴赫尔想要前往麦加，“上前去并将其锁在屋子里”。巴赫尔声称在战斗开始前曾短暂潜入麦加大清真寺，但他的两位战友对此矢口否认。12 月 3 日，收复大清真寺的战斗打响时，三位

① Yaroslav Trofimov, *The Siege of Mecca: The Forgotten Uprising in Islam's Holiest Shrine*, pp. 189 - 190.

② CB 即 dichlorobenzylidene malononitrile，是一种浓缩的粉末化学物。

③ Yaroslav Trofimov, *The Siege of Mecca: The Forgotten Uprising in Islam's Holiest Shrine*, pp. 194 - 196.

GIGN 成员呆在塔伊夫的酒店房间之中。装备有防毒面具和化学防护服的沙特士兵使用 CB 使诸多反叛者晕厥，并同时使用催泪瓦斯和手榴弹，一天以后，沙特通讯社（SPA）发布了塔伊夫王子的声明：“在真主的帮助下”，“对藏身大清真寺地下室的叛乱者腐败团伙的所有成员的清除活动，在今晨 1:30 完成了”。但在傍晚以后，阿布·苏尔坦上尉领导的伞兵抓获了反叛者的领导者朱海曼，朱海曼被带到纳伊夫王子和其他王室高层面前，朱海曼坦言：“如果我知道它会变成这样，我宁愿没有做过。”对于沙特而言，所谓“马赫迪”的死亡让自己拥有了无懈可击的神学证据，即朱海曼的整个团队建立在错误、骗局和谎言的基础之上。^①

GIGN 三位队员在此次武力收复大清真寺事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并了解到沙特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觉得自己身陷危险之境。三位队员在配有法国装备和战术的沙特部队展开收复战斗之后与普托拉暂时失联，使后者焦虑不已，随着三位队员与普托拉恢复电话联系，巴赫尔强调：“你必须让我们离开这里，是立刻。这里非常危险。”随着大清真寺事件的平息，沙特方面同意他们尽快回国。三位队员乘坐有一位美国乘务员的飞机从塔伊夫飞赴利雅得，常驻利雅得的纳夫罗将军在停机坪与他们见面，并在法国军事合作代表团驻地设宴招待。沙特官员赠送给巴赫尔一块刻有哈立德国王肖像的劳力士金表，赠给兰伯特和沃德茨基各一块有沙特空军标志的劳力士蚝式恒动银表。12 月 5 日晚，三位队员最终返回法国。^②

^① Yaroslav Trofimov, *The Siege of Mecca: The Forgotten Uprising in Islam's Holiest Shrine*, pp. 212 - 215.

^② *Ibid.*, pp. 217 - 218.

二、圣地驻军：海湾战争与美军在 沙特“主要行动基地”的开端

虽然海湾战争之前，美国在沙特就有一定的军事存在，但没有像海湾战争以后在沙特的军事存在那样引发伊斯兰激进主义势力的高度关注，也没有上升到“亵渎圣地”这样的程度，这与海湾战争前中东政治思潮的演变有极大关联，也直接影响了美国在沙特军事存在的形式和规模。就海湾战争前的中东政治思潮而言，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20世纪50年代初至1979年）。二战后，随着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入，西亚、北非和东非出现了诸多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就中东具体情况而言，随着第一次中东战争阿拉伯方面的惨败，埃及推翻君主制，建立了高举阿拉伯民族主义大旗的世俗共和国。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前，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在与沙特为首的伊斯兰主义思潮的竞争中占据上风，这种局面在纳赛尔去世、萨达特访问以色列、埃以单方面媾和以后才被彻底改变。事实上，1951年美沙就签订了《军事合作协定》，沙特允许美军使用宰赫兰空军基地，1957年双方将协定延长了5年，美国将该空军基地作为战略空军司令部在中东的临时指挥基地。1960年，随着美军“在海外投射战略力量开始依靠洲际导弹和远程轰炸机，加上阿拉伯民族主义势力的抬头，尤其是埃及和伊拉克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势力强烈反对美国在阿拉伯世界部署军事基地、破坏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和统一，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决定终止租用沙特宰赫兰空军基地”，美空军在该基地的

任务于1961年4月16日结束。^①美国主要通过巴林和伊朗的军事设施实现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随着纳赛尔谋求的阿拉伯统一在中东诸多阿拉伯世俗共和国实践的失败，尤其是1970年纳赛尔去世以后，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逐渐式微。萨达特总统以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为契机，在阿以之间达成了力量的新平衡，为1977年萨达特访以、1978年戴维营和谈以及1979年签订埃以和平协议创造了条件。埃及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旗手，不仅因此被阿盟开除，而且事实上导致了纳赛尔主义的彻底失败。从美军结束驻沙特宰赫兰空军基地任务的1961年，到埃以签订和平协议的1979年期间，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尽管走向衰落，但仍旧具有影响力，因此在此期间，美国在沙特并没有进一步的军事存在意愿。

第二阶段，伊斯兰激进主义思潮（1979—1990年）。伊斯兰激进主义在中东的崛起有其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与宗教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参与度有较高一致性。“宗教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从‘韬光养晦’到‘显山露水’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其中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或称‘六天战争’）可以说是全球宗教发展趋势的重要转折点，这次战争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阿拉伯世界世俗民族主义的失败和宗教民族主义的崛起”，“中东地区的不少年轻人开始从伊斯兰主义，甚至圣战神学家那里寻找身份认同和政治方案，出现了地区性的伊斯兰复兴或‘觉醒’浪潮”。^②1967年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夺取耶路撒冷，对于阿拉伯世界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具有极大的震动性，该事件是伊斯兰激进主义开始萌生的节点，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彻底退

^① 孙德刚：《冷战后欧美大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第123页。

^② 徐以骅：“宗教在1979年”，载《中国民族报》，2016年4月5日第7版。

潮还要等到 1979 年。1979 年埃以媾和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走向低潮的最为醒目的标志，但深层次原因在于宗教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参与度的不断深化，已经走过了“显山露水”的阶段。“宗教在当代国际关系上真正‘登堂入室’的年份是 1979 年。该年发生的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政治、社会和宗教事件，意义十分深远”，“1979 年确实是在宗教上振聋发聩、承前启后的关键年份”。^① 随着 1979 年伊朗爆发革命、麦加大清真寺劫持事件、苏军入侵阿富汗三大涉伊事件的发生，伊斯兰激进主义对沙特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防御伊朗革命输出成为当务之急。以沙特为首的海湾阿拉伯君主国，首先，力挺伊拉克萨达姆政权，1980 年长达 8 年的两伊战争爆发；其次，发展与以色列的实质安全合作，“1982 年，当法赫德国王正式放弃王国反对以色列生存权的政策时，一个双边关系前景的框架得以确立”^②；再次，继续向美国寻求保护，特别是 1986—1987 年两伊油轮战正酣之际，美国空军重返宰赫兰空军基地，但规模仍然有限；最后，将国王头衔改为“两圣地监护者”。可见，沙特为了应对伊朗的威胁，采取了实用主义和恪守教义并举的做法，即在明处武装伊拉克，在暗处交接美以，这一切又建立在将国王与圣地紧密相连的基础之上。因为这一时期，无论是沙特和美国在驻军问题上，所忌惮的不再是相对温和的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而是激进的伊斯兰主义。与此同时，以本·拉登为首的伊斯兰激进势力重心在阿富汗抗击苏联，并且本·拉登还在

① 徐以骅：“宗教在 1979 年”，载《中国民族报》，2016 年 4 月 5 日第 7 版。

② Yoel Guzansky, Sigurd Neubauer, “Israel and Saudi Arabia: A Changing Region, A Possible Partnership?”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ly 24, 2014,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israel-saudi-arabia-changing-region-possible-partnership-10940> (登录时间：2018 年 11 月 4 日)。

冷战的历史背景下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因此“基地”组织此时对美军小规模重返沙特宰赫兰空军基地一事保持沉默。

1990年萨达姆入侵吞并科威特，彻底打破了海湾阿拉伯君主国与伊拉克之间为应对伊朗威胁而形成的脆弱的准联盟关系，而在此之前1988年两伊战争的结束已使得双方之间的关系变得脆弱。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国家长期扶植萨达姆政权的行为，虽然有效抵御了伊朗的革命输出，但其成员国科威特在两伊停战两年后被伊拉克吞并，无异于“养虎为患”。对于沙特而言，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意味着沙特与伊拉克之间彻底摊牌，沙特在海湾地区面临着同时对抗两伊的不利局面。随着1989年2月苏军撤出阿富汗和当年东欧剧变的开始，以本·拉登为代表的伊斯兰激进势力开始将矛头对准美国和沙特。但在这种紧迫的局势下，沙特联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反击伊拉克、维护海合会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仍成为当务之急。就连高举世俗民族主义大旗的伊拉克复兴社会党的萨达姆政权，在多国部队即将对其动武的前几日，正式在国旗上加上了萨达姆手书的“安拉至大”字样，以最大限度通过宗教的号召力来为其侵略战争的恶果“买单”。1991年1月17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展开了打击伊拉克、解放科威特的军事行动，海湾战争正式爆发。在美国大规模驻军沙特的问题上，美沙之间形成了高度共识，沙特需要依靠美国强大军事实力的保护，特别是在美苏争霸的优势天平已向美国大幅度倾斜的时刻。

1990年8月5日，美国国防部长切尼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访问沙特，要求确保美军能够利用沙特领土展开军事行动。法赫德国王希望，如果开战的话萨达姆将“无法东山再起”，得到了美方的保证以后，法赫德国王同意接受美国军队，但这显

然与阿卜杜拉王储的建议相左。^① 8月6日，切尼向沙特保证：“在威胁结束以后，我们的军队将返回家园。”美沙之间在此问题上并未签订正式协定，美军在萨达姆入侵科威特之后进驻沙特的数量达到1万人，直到2003年4月底才完全撤出。“外国军队在伊斯兰最为神圣之圣地的存在，在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而不仅仅是那些具有圣战倾向的穆斯林中，引发了惊愕”，本·拉登就在1997年的一次采访中宣称：“我们已将我们圣战的宣言聚焦在对沙特境内美国士兵的打击上。”^② 虽然严格来说，在沙特只有麦加和麦地那才是伊斯兰圣城，但两大圣城的主权都属于沙特王国，沙特国王又以“两圣城监护者”的身份自居，因此，在伊斯兰激进主义思潮的语境下，整个沙特王国都被视为伊斯兰圣地。虽然美军入驻的并非麦加与麦地那，但其大规模进驻沙特的行为仍被视为圣地驻军，并认为这是异教徒对伊斯兰圣地的亵渎。为了美军顺利入驻，沙特逊尼派领袖阿卜杜阿齐兹·伊本·巴兹（Abdulaziz bin Baz）发布“法特瓦”为王室行为提供宗教合法性。巴兹在发布的第一个“法特瓦”中指出：“沙特政府这样做的起因在于，通过向大量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卡费尔，*kuffar*）所组成的军队一并寻求抵抗军事侵略和保卫国土（即半岛）的帮助，在反对伊拉克国对科威特国的压迫上所取得的这些较好的进展。”“已经可以确定的是，伊拉克总统并不被科威特这个国家的普通民众信任。因此对他来说，背信弃义是意料之中的。正因如此，在保卫土地及其人民的大量外国军队，以及土地及其人民在每件事情的安全和福祉的热望，

① Gary Sick, "Better for Business," *The Iranian*, August 3, 2000, <http://www.iranian.com/Opinion/2000/August/Cheney/index.html> (登录时间: 2018年11月4日)。

② Nick Gier, "Could King Hussein Have Stopped Saddam Hussein?" <http://www.webpages.uidaho.edu/ngier/Hussein.htm> (登录时间: 2018年11月4日)。

有必要采取预防与帮助措施。”^① 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召集支持他的来自不同国家的穆斯林代表开会，并攻击沙特境内“异教徒”的存在；沙特则召集最为著名的伊斯兰教讲经布道者开会，会议声明支持沙特国王的立场。此后巴兹又发布了第二个“法特瓦”，指出：“今天所采取的针对真主之敌——伊拉克的统治者萨达姆的圣战，就穆斯林和那些帮助他们的人而言，是一场合法的圣战。”^②

海湾战争以后，美军在沙特的军事存在主要以军事基地的形式体现出来。关于军事基地有很多的分类标准，就海湾战争前、海湾战争至“9·11”事件前，以及“9·11”事件后三个阶段的不同特点，从基地管理方式的角度来看，美国在沙特的军事基地主要对应着三个阶段：前沿行动基地、主要行动基地、合作安全基地。美军20世纪50年代初至1961年初，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期小规模重返沙特宰赫兰空军基地属于“前沿行动基地”，其特点是有限的使用权，目标是寻求预防危机的爆发而非永久驻扎进攻性部队；海湾战争以后，美军在沙特的军事基地属于“主要行动基地”，其特点是美军拥有更多的治权，拥有永久驻扎的战斗部队、健全的基础设施、典型的指挥和控制系统、维持官兵及其家属生活的基本设施、强化军事力量的保护措施等；^③ 海湾战争后美国在沙特的“主要行动基地”阶段，美军获得了海尔季（al-Kharj）等军事基地，部署了4000—5000名军事人员、6个爱国者导弹连、100架作战飞机，但伊斯

① “Satanic Fatwa of bin Baz and Some Remarks,” October 9, 2008, <https://millatibraheem.wordpress.com/2008/10/page/3/>（登录时间：2018年11月4日）。

② “War in the Gulf in 1991: Muslims, Saudis Decree Holy War on Saddam Hussein,” i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0, 1991.

③ 孙德刚：《冷战后欧美大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第35页。

兰激进主义势力无法容忍美国在圣地驻军的行为，针对沙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展开了诸多暴力恐怖袭击活动，促使美沙在1996年决定将美军基地搬迁至偏远的沙漠地区，主要是苏尔坦亲王空军基地，但人数有增无减，从1994年的1000人增至2000年的约7500人。总而言之，截至“9·11”事件之前，美国在沙特拥有13处独立使用的军事基地、66处军事设施，部署各类军用飞机300余架。^①

由于沙特允许美军大规模进驻只是权宜之计，美国并不打算推翻萨达姆政权，只是对其进行制裁和削弱，这为美军长期驻扎沙特提供了最佳理由。本·拉登自海湾战争起便反对非穆斯林的参与，对于美军进驻沙特更是坚决反对。在“9·11”事件爆发前数年，本·拉登就从伊斯兰教义的角度对美国进行了连续批判。1998年，本·拉登联合埃及、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支持者发布了“向犹太人与十字军进行圣战”的“法特瓦”，其中指出：“7年多以来，美国在最为神圣的地方阿拉伯半岛占领了伊斯兰的土地，掠夺其财富，对其统治者发号施令，羞辱其人民，恐吓其邻国，并将其在半岛的基地变为藉由其打击邻国穆斯林民众的先锋。”“杀死美国人及其军民盟友的命令，是每一个可在任何有可能为之的国家中将其完成的穆斯林的个人职责，即为了从他们手中解放阿克萨清真寺和神圣的清真寺（麦加），还为了将他们的军队从伊斯兰的所有土地上移除，使其被挫败且无法威胁到任何穆斯林。”^② 1999年，本·拉登在一

^① 孙德刚：《冷战后欧美大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第127—128页。

^② Shaykh Usamah Bin - Muhammad Bin - Laden, Ayman al - Zawahiri, Abu - Yasir Rifa'i Ahmad Taha, Shaykh Mir Hamzah, Fazlur Rahman, "Jihad against Jews and Crusaders: World Islamic Front Statement," February 23, 1998, <https://fas.org/irp/world/para/docs/980223-fatwa.htm>（登录时间：2018年11月4日）。

次访谈中指出：“他一直反对美国人，因为他们在沙特阿拉伯的军事存在，还因为他觉得他们离麦加太近了。那对整个穆斯林世界都是一种挑衅。”^① 2001年“9·11”事件的爆发对美沙都是巨大的冲击，“9·11”事件的策划者是本·拉登，劫机犯多为沙特籍人，这使得沙特王室和美国小布什政府都承受了巨大压力。尽管美沙顶住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依旧维持着持续数十年的盟友关系，但美国也对沙特明确提出了进行民主改造的要求。美国为了应对驻军圣地以来伊斯兰极端主义带来的压力，一方面发动阿富汗战争，一举推翻“基地”组织和本·拉登的庇护者塔利班政权，另一方面开始从沙特撤军，将军事基地转移至其他中东国家。如果说美国打击与“9·11”事件有直接关联的“基地”组织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或默许，那么2002年开始策划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就遭致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其欧洲盟友也分裂为“新欧洲”与“老欧洲”。沙特不允许美军从沙特境内打击伊拉克，美军2002年逐步将军事基地迁往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等其他海湾君主国，其在海湾的军事重心已不再是沙特。2003年初，小布什政府宣布打击伊拉克并从沙特撤出大部分武装力量，此后美军在沙特的存在方式转向“合作安全基地”，其特点是规模小、形式灵活、成本低。

^① Rahimullah Yusufzai, "Face to Face with Osama," in *Guardian*, September 26, 2001,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1/sep/26/afghanistan.terrorism3> (登录时间: 2018年11月4日)。

三、异教武装之圣地亵渎：伊斯兰 激进主义恐怖转向的“助推剂”

在伊斯兰激进主义者看来，无论是美国 CIA 和法国 GIGN 受邀介入麦加大清真寺平叛事件，还是美国利用组建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发动海湾战争之机趁势大规模驻军沙特，都是非伊斯兰的异教徒武装对伊斯兰圣地的严重亵渎。由于麦加大清真寺事件同时涉及了伊斯兰的三个禁忌（禁月、禁地、禁寺），而美军在海湾战争后大规模进驻沙特则被视为对拥有两大圣城的广义的圣地的侵犯。发生在 1979 年年底和 1991 年年初的两大转折性宗教历史事件，是伊斯兰激进主义土壤最终产生暴力恐怖主义的“助推剂”，尤其后者是打着伊斯兰旗号的暴力恐怖主义最终脱离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最后一根稻草”。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兴起有长期的历史过程，西方国家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首先，伊斯兰世界的整体衰落与西方的强势崛起形成鲜明对比，曾经的辉煌历史与正不断远离世界舞台中央的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促使伊斯兰世界内部甚至当前欧洲穆斯林内部出现了以激进宗教思想来进行抗争的路径。历史上，阿拉伯帝国与欧洲之间的文明与技术交流频繁且互有促进。随着 1492 年西班牙最后一个穆斯林政权的垮台和新航路的开辟，欧洲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力量对比开始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特别是欧洲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兴起后，奥斯曼帝国一蹶不振，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终解体，广阔的奥斯曼帝国属地沦为欧洲殖民列强瓜分的对象。“当今中东的衰落则是自阿拉伯帝国辉煌文明的巅峰之后的一种延续。实际上，欧洲与中东的文明和科技交

往由来已久，呈相互作用的态势”，“这些极大促进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以及欧洲后来的繁荣兴盛，而中东最后则逐渐走向精神上的保守和宗教上的激进，并最终导致其迄今仍身陷‘后蒙昧时代’”。^① 不仅如此，这种历史的惯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内部也不断出现，具体体现为“欧洲的伊斯兰”与“伊斯兰的欧洲”之间的对峙。二战以后，欧洲走上了一条自由主义的道路，以法德煤钢联营化解百年民族仇恨为起点，开辟了一条欧洲一体化的金光大道。饱受战争摧残的西欧国家极其珍视来之不易的和平，尽管经历了数十年东西欧的对峙，但欧洲在战后基本上保持了长久的和平，欧盟被视为民事力量与规范性力量的典范。欧洲大力推行以人权为核心的民主规范，及时摒弃旧殖民主义以后，积极承担大国责任，发展与亚非前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在此背景下，大量穆斯林较为便捷地移居到前宗主国。英国穆斯林主要来自南亚，法国穆斯林主要来自北非，德国穆斯林主要来自土耳其。欧盟期望在自由、民主、人权等世俗价值观的基础上来消融穆斯林移民，即将个人信仰与公共领域相剥离，让穆斯林成为欧洲的有机组成部分，即“欧洲的伊斯兰”。由于伊斯兰教本身发展阶段及其政治性宗教的特质与宗教改革以后的基督教有着根本性不同，再加上穆斯林移民及其后代作为文化上的少数族群，以及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很难完全融入欧洲主流社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欧洲穆斯林在享受相较于中东地区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与政治环境的同时，对欧洲国家却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不满，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在欧洲现有制度下自觉前景无望，转而期望开辟新路，即回到正统伊斯兰价值观，谋求打造一个“伊斯兰的欧洲”，大量修建

^① 钮松：“国家兴衰的秘密”，载《人民政协报》2010年6月7日。

清真寺并实施伊斯兰教法的呼声层出不穷。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数十万穆斯林难民流亡欧洲，欧盟一方面基于其自身价值理念呼吁成员国积极接纳中东难民，放松边界管制，为南欧和中东欧成员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另一方面又基于其内部安全考虑对伪装成难民的中东恐怖分子忧心忡忡，这些中东恐怖分子与欧洲本土的“伊斯兰国”支持者在欧洲会师，法国和比利时的暴恐案便是其合力所为。欧盟的双重矛盾思绪实为“欧洲的伊斯兰”与“伊斯兰的欧洲”之间剧烈碰撞的反映。

其次，从历史渊源看，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的兴起与欧洲有着密切联系，尤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内部不同阵营的博弈和冷战期间美苏争霸密切相关，伊斯兰极端主义逐渐意识形态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与英法帝国主义为首的协约国进行全方位对抗，与奥斯曼帝国同属同盟国的德意志帝国大力鼓动英法的亚非殖民地人民揭竿而起，反抗英法的统治。英法从中东地区招募了大量穆斯林士兵，在战争中许多协约国穆斯林士兵被德国俘获，德国在柏林郊外的措森（Zossen）建立了“半月”（德文为 Halbmondlager，英文为 Half Moon）战俘营并由此开启其系统性与目的性兼备的庞大洗脑工程。这些穆斯林战俘不仅在生活条件上得到较好保障，更为关键的是其宗教信仰得到别有用心的高度重视，如提供宗教经典，允许遵守斋月，建立德国首座清真寺，精神领袖和学者前来进行布道等。该工程的始作俑者是德国贵族与冒险家马克斯·冯·奥本海姆（Max von Oppenheim），其目的是将协约国穆斯林士兵转化成为效忠德国的“伊斯兰圣战士”，他向德皇保证，伊斯兰是德国的秘密武器，精心策划的宣传运动将会在英法殖民地印度、印度支那、北非和西非等地引发针对英法的穆斯林起义。不仅如此，德国怂恿奥斯曼苏丹在伊斯坦布尔的一座清真寺宣布英法俄为伊斯

兰的敌人，德国驻奥斯曼大使则在使馆阳台上一唱一和，其身边簇拥着 14 名来自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等北非国家的战俘。一名“半月”的前战俘指出，“他们甚至帮了我们一个忙，并给了我们一个厨房。猪肉是不会给我们的。他们给我们很好的肉、抓饭和鹰嘴豆等食品。他们给了三条毛毯、内衣和一双鞋等物品。给我们每一个人。他们每三天带我们去洗一次澡，并给我们理发。”尽管德意志帝国与奥斯曼帝国战败解体，但“德国制造的吉哈德”这一幽灵四处飘散。^① 冷战期间两大阵营之间除了世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之争以外，其争斗领域也延及神学信仰领域，即有神论与无神论的对峙。保守的海湾阿拉伯君主国出于对无神论的恐惧而与西方阵营在神学利益上具有一致性。苏联虽然在宗教与部族思想深厚的阿富汗扶持了社会主义政权，但其入侵阿富汗的战争激起了极大的反弹，以本·拉登为首的各国伊斯兰激进势力齐聚阿富汗展开对苏“圣战”，他们与西方在反苏及其衍生目标上存在一定的重合性，抗苏战争为“基地”组织的崛起和塔利班政权的坐大提供了契机。随着宗教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全面回归，经过 100 余年的发展尤其是“9·11”事件以来，以“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进一步凸显“吉哈德”之中作为剑的“吉哈德”这一层面的涵义，来为其针对平民的暴力行径提供依据。因此，从历史长线来看，欧洲是中东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但从恐怖渊源上看，欧洲实则是自身麻烦的制造者。

^① Florence Waters, "Germany's Grand First World War Jihad Experiment," in *Telegraph*, August 10, 2014, <http://www.telegraph.co.uk/culture/museums/11022199/Germanys-Grand-WW1-Jihad-Experiment.html> (登录时间: 2018 年 11 月 4 日)。有关德国与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关系还可以参见: Ian Johnson, *A Mosque in Munich: Nazis, the CIA, and the Rise of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the West* (Boston: Mariner Books, 2011)。

尽管伊斯兰激进主义的诞生和兴起与西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对伊斯兰激进主义有着诸多直接或间接影响，但将伊斯兰激进主义彻底推向西方的对立面，并最终发展出暴力恐怖主义则与西方对伊斯兰圣地的两次关键性介入有着难以回避的联系。法国 GIGN 主导了麦加大清真寺的平叛工作，包括对沙特军队的战术培训和相关武器装备的配备，但事件发生地点毕竟是伊斯兰最为神圣的圣物天房和黑石所在的禁寺，这严重触碰到了全世界穆斯林的底线，“围绕着天房、禁寺及其周边的神圣空间，很自然地成为伊斯兰教物质与精神上的中心”，“很容易看到天房是现世生活之中心的这个观念，如何决定穆斯林的虔诚”，“由于猎杀在这块神圣区域内被禁止，一旦向禁寺靠拢，穆斯林们就可以安全地生活下去，就如同羚羊和鸽子那样不被打扰，但只要他们离开禁寺，他们就是脆弱的且容易沦为致命的外来影响的牺牲品”。^① 法国非穆斯林武装人员不仅主导了禁寺内部穆斯林之间的武装冲突，而且 GIGN 参与该事件三位队员的领队天主教徒保罗·巴赫尔甚至同意为完成此次任务可以考虑通过形式上的改宗伊斯兰而顺利进入麦加和禁寺，而这实际上违背了法国政府的要求，他在 1984 年出版的回忆录《非常特别的使命》中声称，在行动前曾短暂潜入麦加考察战场的事实。^② 尽管法国 GIGN 是秘密参与该行动，但伊斯兰激进势力此后将矛头对准法国的事实表明这种保密是徒劳的。海湾战争以后美军在沙特的驻军行为与法国 GIGN 参与大清真寺平叛活动在任务期限、扮演角色、人员数量、装备水平、公开度等方面有

① Annemarie Schimmel, "Sacred Geography in Islam," in Jamie Scott, Paul Simpson - Housley, eds., *Sacred Places and Profane Spaces: Essays in the Geographics of Judaism, Christianity, and Islam*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91), pp. 164, 166.

② 参见 Paul Barril, *Missions Très Spéciales* (Paris: Presses de la Cité, 1984)。

着巨大差异，法国 GIGN 的任务期限较短、扮演的角色仅仅是联络员和训练者、人员数量只有三人、装备水平上仅为城市反恐作战所需的瓦斯、防弹衣、手榴弹等常规先进武器、公开度上在当时保持着高度机密，这些特点极大减缓了其对“禁月”“禁地”“禁寺”的宗教冲击。美军的任务期限是争取长期驻扎、扮演角色是海湾地区安全的保护者、人员数量和规模上达到数千人、装备水平上则是各种高精尖武器、公开度上是公开基地和秘密存在相结合。虽然美军在沙特的军事基地和军事存在未涉及麦加和麦地那两大圣城，但其以上诸多特点使得伊斯兰激进势力认为这确实将麦加置于异教徒的武力阴影之下了。可以说，伊斯兰激进主义恐怖转向的源头在 1979 年，正如亲手抓获麦加大清真寺事件领导者朱海曼、曾由法军培训的军官阿布·苏尔坦在 2006 年所言：“我们如今看到的所有恐怖分子都是朱海曼的遗物”，“假如这些人掌握今天的新科技，他们大概已最终征服了全世界”；^① 而伊斯兰激进主义最终完成恐怖转向是在 1991 年，“本·拉登在 1991 年就失去了选择——曾经在阿富汗的抗苏斗士已与沙特阿拉伯闹翻，因为在反对海湾战争期间，这个极度保守的王国驻扎了美国军队”。^②

^① Yaroslav Trofimov, *The Siege of Mecca: The Forgotten Uprising in Islam's Holiest Shrine*, pp. 254 - 255.

^② “CIA Docs from Osama bin Laden Raid Suggest Iran - al Qaeda Link,” in *CBS News*, November 2, 2017, <https://www.cbsnews.com/news/iran-osama-bin-laden-al-qaeda-before-september-11-terror-attacks-cia-documents/> (登录时间: 2018 年 11 月 4 日)。